

編者按

本期「百年中國與世界」與「人文天地」二欄著眼於民國時代的思想、教育問題。董國強審視五四前後的「問題與主義」之爭，認為李大釗、胡適的論戰是從學理討論的層面展開的，而且胡適對李大釗研究「主義」採用的方法論、理解和評價各方面都有深刻影響。段懷清考察胡適與梅光迪由志同道合而漸行漸遠的原因，是在於胡適所選擇「實踐」、「嘗試」的主張與他一直思考的學術方法問題有著邏輯上的直接關聯，而梅光迪卻在抗戰的顛沛流離中逐漸失去思想光輝。羅明分析了李叔同斟酌自傳統思想的審美教育觀——以「藝德」為宗旨，以自然修身、藝術陶冶為「成人之德」的養成途徑。此外，這兩欄也涉及江青與樣板戲的話題。梁家貴重新詮釋了相關史料，指出抗戰至建國期間的江青雖有不少缺點，依然思想較上進、行動較進步，不可因其文革的作為而將之全盤否定。林榮基看到，樣板戲發揮了強大的政治渲染力，使得無產階級專政論更為鞏固。何立慧則論述樣板戲作為文革政治話語的載體，起到傳播和加強這一話語的作用；其對敵我矛盾的絕對化，就是文革批鬥會情景的原型。

進入秋冬時分，人們又對SARS提高了警惕。本期「社會、經濟與傳媒」欄中，李慶四深入探討了中國政府在SARS初期的被動反應、後來的果斷決策、危機公關的成功及其啟示。劉永謀則指出SARS討論開始後，學者紛紛依托學科理論尋找寫文章的視角，把各種理論往SARS頭上扣，然而這種情況卻暴露出當前知識界在批判性思維方式、追問前提的精神、問題意識、理論原創力四方面的缺乏。

「政治與法律」一欄中，田湘波探討了一個過去被人忽略的課題——1927-37年間國民黨中央與地方的黨政關係。他分析當時的情況是：中央黨部高於政府，而地方黨部又低於省縣政府，故要以黨治國，糾紛

在所難免。張允美梳理了49年後工會與黨、國的關係，得到這樣的結論：傳統時期，工會因表達勞動者的要求而受到批判；改革時期，工會卻因「經濟主義」的攻擊下而影響日微，這種情況使工會淪為服務於國家利益和社會穩定的工具。

「隨筆觀察」欄以新詩為主題。沈奇以為，只有品味、語言特性等本質，才能支撐新詩作長久而深入發展；其危機並非市場、時尚、商業化、物質化多媒體衝擊等外部際遇，而在於自身內部，如根性的缺失、典律的渙散以及心理機制的各種病變。而潘靈劍則專論穆旦的詩歌，指出穆氏在對歷史與人生不斷的沉思中，作品內容也從歷史輪回感和人生悖謬之表現轉向痛苦思辨的主調。

本期「讀書、評論與思考」欄中，王金玉對《道德經》與近代政治文明二者的聯繫作出有特色的清理。另外三篇書評曾刊於本刊印刷版，分別就論現代文學、近代史和革命話語，可與本期各文參照。